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之七

## 彼·库·科兹洛夫考古发现的科学价值

~~~~~  
供内部参考，如需  
引用，请逡从原文  
~~~~~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编印

1979·8·呼和浩特

〔按〕《彼·库·科兹洛夫考古发现的科学价值》一文，是彼·库·科兹洛夫的儿子B·П·科兹洛夫为了介绍他父亲在我国哈拉浩特（黑城，在今额济纳旗境内）和蒙古诺颜山古墓考古发现而写的。该文载于彼·库·科兹洛夫所著《蒙古、阿木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中，类似该书的前言。这篇文章特别对彼·库·科兹洛夫在我国黑城地区的考古发掘均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彼·库·科兹洛夫于1907—1909年及1926年先后两次到黑城私自进行发掘，得到了大批珍贵文物。这批文物是属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西夏国所有，是了解西夏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宝贵材料。《蒙古、阿木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据科兹洛夫说，他在哈拉浩特发掘中，一次就得到了二千卷唐古特文古书、三百幅画和一部《唐古特—汉语辞典》。这些古物全被窃走。1924年，彼·库·科兹洛夫在蒙古诺颜山古墓的发掘物是属于汉朝时代，也就是公元前4—3世纪。这批古物对于了解二千二百年前匈奴人们社会，也是很珍贵的资料。因此，我们将该文译载于此，供研究蒙古史的同志们参考。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内蒙师院外语系翻译组

1979·7·15

## 彼·库·科兹洛夫考古发现的科学价值

（苏）B·П·科兹洛夫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的目的是要简略地谈一谈苏联考古学家们对彼·库·科兹洛夫所获得的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以及科兹洛夫的考古发现的科学价值。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主要利用了《蒙古、阿木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的初版于1923年问世后所发表的研究哈拉浩特发现物的著作。此外，我们还浏览了弗·尼·卡津<sup>①</sup>的手稿：（一）《哈拉浩特城的历史》——1936年报告提纲；（二）《哈拉浩特城是一座有考古价值的古迹》——1940年在国家东方文化博物馆（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术史会议速记稿。我们还浏览了索·米·科切托娃<sup>②</sup>1946年写的手稿《哈拉浩特的佛像遗

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卡津是列宁格勒美术博物馆的科学工作人员，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不幸牺牲。

② 索菲娅·米哈伊诺夫娜·科切托娃是副博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人员。

》(中国风格)。

弗·尼·卡津在仔细地研究中国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著作,阐明了哈拉浩特城和甘肃西部居民过去的历史。

索·米·科切托娃的著作研究了在哈拉浩特发现的佛象,阐明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对这些艺术作品的影晌。科切托娃的著作对谢·赞·奥尔登堡院士<sup>①</sup>的研究著作是一个补充(奥尔登堡研究了哈拉浩特的神象,主要是西藏画法的神象)。

哈拉浩特城<sup>②</sup>的历史如下。哈拉浩特城(唐古特人称为伊金崖)位于由南往北穿越戈壁沙漠的额济纳河的下流(甘肃地区)。额济纳河谷地在古代是蒙古北部游牧民族侵袭中国西部的方便途径。额济纳河的此种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哈拉浩特的历史作用。因此,当中国人于公元前二世纪夺得额济纳河谷地时,他们就竭力往这里移民并在这里构筑工事,这就毫不奇怪了。

卡津写道:“有关中国人在这个地区构筑工事和建立城市的首批资料是在公元前101年。汉朝时,这个地区有座高阳城,或称西海县城。有关这座城市的简略的片断资料记载到五世纪”。此外,有资料记载道,唐朝时,即七世纪至八世纪时,在额济纳河下游有座通城绍州要塞。

从八世纪中叶起,几百年之间,在中国文献中有关于额济纳河下游的资料,因为那时整个甘肃地区为吐番所占有。

甘肃有六百年之久没有列入中国版图,不过它的居民和文化基本上还是中国的。

在吐番于九世纪中叶解体后,甘肃西部分裂为几个独立的王国。十世纪出现了唐古特人国家西夏,它于十一世纪初兼并了中国西北边境地带的几个小的王国。唐古特人夺取额济纳河谷地是在十一世纪三十年代。

根据卡津的资料,历史上首次提到伊金崖城(哈拉浩特)是在公元十二世纪时。当时,在额济纳河下游有一座唐古特城市,中国史书称之为海苏城,又称伊金崖。西夏国从982年起存在到1226年,于1226年为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征服。攻占西夏是这位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的最后一次远征。他崩于1227年。

蒙古人在唐古特人国家境内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不过哈拉浩特城看来当时没有被完全破坏,也许是破坏后又很快地恢复了。总而言之,在中国元史上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哈拉浩特城,最后一次提到是在十四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提到额济城(哈拉浩特)。

哈拉浩特留在蒙古人手中直到1372年,这一年,明朝的中国军队侵入了额济纳河下游地区,占领了哈拉浩特城。

和其他蒙古城市一样,哈拉浩特也被破坏了,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从西部威胁中国的一个据点。

而且,现在人们也知道,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已在额济纳河下游构筑工事防御游牧民族,不过还不能断定,哈拉浩特是否就建立在一个古代要塞的地方。

<sup>①</sup> 见参考书目。

<sup>②</sup> 据历史资料记载,哈拉浩特是西夏的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和要塞,而西夏的首都是东京,后改名为宁夏(见彼·库·科兹洛夫1909年在哈拉浩特的发现物)。

彼·库·科兹洛夫在1908年发现了哈拉浩特。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在这个地方发掘，1909年又继续发掘。1926年，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考察中再次访问了哈拉浩特。除科兹洛夫外，只有英国考古学家阿乌别尔·斯坦因于1914年在哈拉浩特发掘过。

彼·库·科兹洛夫的考古发现早已得到了公认。哈拉浩特的发现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从而填补了在认识中央亚细亚各民族历史方面的空白点，并揭示了中国和西藏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的的影响，而尤其重要的是使科学界能够看懂用唐古特文字、即现已属死文字的西夏文字记载的古代唐古特书籍。<sup>①</sup>

彼·库·科兹洛夫在其著作中指出，多数发掘物是在一座著名的宝塔中获得的。关于这些发掘物，弗·尼·卡津在其报告中（1945年）指出：“在著名的宝塔中获得的书籍告诉我们，该宝塔约在1220年，即早在成吉思汗军队毁坏哈拉浩特之前就已建立起来了，从而保存下了西夏国的文化遗产”。用唐古特文字（西夏文字）写的书面残简占多数。据卡津研究，唐古特文残简有1400片，汉文残简有78片，藏文残简有13片，还有一片残简是用维吾尔文字体写的。

关于彼·库·科兹洛夫的发现的科学价值，卡津写道：“科兹洛夫的发现对于辨认唐古特（西夏）文字有巨大意义。在这一发现以前，人们仅仅知道铸有两夏文的几枚钱币，还有几块碑铭和唯一的一份手稿，而彼·库·科兹洛夫却带回了数百份手稿和相当可观的汉文和唐古特文印刷书籍。

由于这些发现，阅读现时已经不用并被遗忘了的唐古特文字就成为可能了。在发掘的书籍中有一部《唐古特文——汉文字典》，因此就能够辨认在这以前人们不懂的唐古特文字了。

在发现的文字遗物上面，大多数都有佛教经文；此外，也有一些儒家文物；有两部用唐古特文写的法典，这对于研究我们很少知道的唐古特人国家（西夏）的历史很有价值；还有一些谚语集、颂诗、几首寓言和故事，中国周朝时代的几位军事作家的著作的唐古特文译本，等等。

我们所掌握的唐古特文资料，比世界其余地方所拥有的全部唐古特文材料超过许多倍。例如，除了我们这里，任何地方也没有非佛教文献古物。

科兹洛夫所收集的物品，不仅有书籍，而且有印书的工具，如有为印刷唐古特文书籍和单本画册用的木刻板。

书中的木刻画保存下来很多，这对于研究中国木刻画史很有价值”。

由于在敦煌<sup>②</sup>发现了九世纪和十世纪的中国木刻画和印刷术的极古老的文物，在哈拉浩特又发现了十一、十二、十三世纪的木刻画，因此，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材料提供了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印刷术和木刻画的早期历史的全部情况。

彩色画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拜佛这个宗教题目，只有几幅画和木刻画含有世俗内容。这两种画对我们都有价值，因为它们既是当时的艺术古物，又是能说明其他国家对

① 西夏的唐古特文字出现在十一世纪前半叶。但汉语和汉文在西夏境内仍被广泛使用（《东方图书索引》，1933年，第2—4期）。

② 敦煌窟位于离敦煌城十四公里的地方（在中国极西部）。窟的墙壁上装饰着佛像壁画，雕象和祭坛，是公元450—1100年时期的作品；见《苏联大百科全书》，1931年版，第23卷。

中央亚细亚人民的彩色画的影响的历史文献。研究哈拉浩特彩色画的有两部著作：谢·费·奥尔登堡院士1914年写的一部著作和索·米·科切托娃副博士1946年写的一部著作。

谢·费·奥尔登堡指出，根据画法类型和构图来看，哈拉浩特彩色画可以分为两大类：西藏画法和中国画法。从上述两个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第一部著作（奥尔登堡所著）谈的是西藏画法，第二部著作（科切托娃所著）谈的是中国画法。

卡津在谈到这种或那种文化对哈拉浩特居民的影响时指出，整个甘肃西部地区（哈拉浩特就在这个地区）从它被中国首次征服时起，即从公元前二世纪时起，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直到十一至十四世纪期间才也受到西藏文化的影响。从图形来看，佛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中国类型和西藏类型。据索·米·科切托娃研究，这种区分表现如下：“佛教直到公元五世纪才被承认为中国的国教，它与业已定型的中国美学规范以及在技巧和艺术手法上都很高超的中国彩色画发生了冲突。

画赤身露体、婀娜多姿、体态轻盈的人体画的印度美学，与儒家的清教徒的要求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彩色画上不允许有不穿衣服的裸体象，相反，应当把人画成穿着又长又肥的衣服，把整个身体完全盖住”。

“金钢宝座佛”象（见插图一）是西藏画法的典型例子。而“阿弥陀佛在苏卡瓦蒂天堂接待善男信女”象（见插图二）和木星君象（见插图三）、土星君象（见插图四）则表示中国画法的一般特征。

据谢·费·奥尔登堡考证（1914年），“在那里（即在哈拉浩特）发现的西藏画法的神象与中国画法的神象截然不同，从而确凿地证明，印度彩色画对古代西藏彩色画有着根本的、决定性的影响<sup>①</sup>，同时，对唐古特彩色画也有影响（如果唐古特人国家有过自己独立的彩色画派或神象画派的话）”。这种情况就把西藏彩色画与中国彩色画一下子区别开来，因为印度彩色画是属于西方画法的。的确，如果我们把几乎总是按中国画法画的云和龙不计在内，那我们简直找不到任何东西是按中国画法画出来的。

神象画的技巧和构图几乎与今天西藏神象画完全一样，这里也表现出西藏保守得惊人，那星的画法一千多年来没有任何改变。

关于西藏画法的神象，谢·费·奥尔登堡继续写道：“至于谈到神象的内容，我们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没有佛和罗汉们的生活画，画面上也没有佛和罗汉的生活背景，而这种画在印度壁画和中亚壁画上，有时也在印度细密画上却屡见不鲜，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有些神象画家在热心地复制。

在哈拉浩特发现的佛象中，我们首先发掘到的是释迦牟尼佛象，按数量说在所收集的神象中居首位，而且主要是在佛教界最受尊敬的“金钢宝座佛”象（见插图一）”。接着，谢·费·奥尔登堡列举了在哈拉浩特发现的神象上的诸神，并指出，在这里，“所有的神大体上与今天西藏和阿木多供奉的相同，只是今天供奉的喇嘛大师与过去不同罢了，例如，在发现物中没有与‘黄教’及其创始人宗喀色有关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因为哈拉浩特是在十四世纪、即在黄教传入蒙古之前被毁坏的。

①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B·K。

总之，哈拉浩特的西藏画法佛象是印度佛象画与较晚的、十六至十九世纪西藏佛画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环节”。

从哈拉浩特带回来的中国画法神象，是由索·米·科切托娃整理的。她把这些神象分为两大类：“最重要的一类神象中有与阿弥陀佛有关的诸神的单独群象。这一类共有三十幅，如果把兼有印度风格和中国风格的阿弥陀佛天堂画计算在内的话”。

第二大类计有十八幅，画的是星君象，其中有一些是一佛居中诸菩萨居两侧的群神象。

整个第一类都是以阿弥陀佛为首诸神举行安灵仪式的神象。这些神象以及在哈拉浩特著名宝塔中发现的死者遗体，证明画这些神象的直接目的是要“博得”阿弥陀佛对死者的“宽恕”。

第二类是星君象。①这类神象多与生活主旨及自然现象有关。按佛教看法，这些星君各以其本身的特色似乎予兆人们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项事件，以及某些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季节来临。

哈拉浩特古物上描绘的拜天仪式是从印度传来的异国的佛教仪式。在这里，受希腊文化以及伊朗文化的直接影响而在印度创制出来的异国神象，与在当地创制出来的印度神象、中国神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创造了独特的、混合的祭天神象。

在哈拉浩特神象上面，土星君象（见插图四）与印度的土星君象很相似，但有中国的特点，即（一）与中国的土地神一样，他手里拿的是木制拐杖，而印度土星君拿的却是权标；（二）他手中拿着道士施展魔术仙法时用的道家印鉴；（三）他身上穿着遮住全身的中国长袖衣服，而且衣服的颜色与他本人的皮肤一样，是黄色。

木星君（见插图三）（在木星君象上方的圆圈里画有表示木星君自然力——唐古特木头标志）被画成一位官员。这幅画与佛经中把木星君画成一位大官以及道教著作中所叙述的相符合。道教著作提到木星君审理案件，颁布特赦，施加惩罚，手持笏板护国降妖……

索·米·科切托娃写道：“应当指出，看来，崇拜星君在十三世纪后已失去意义，因为在西藏神象中遇到崇拜星君的情况极少，象在哈拉浩特发现如此大量的拜星君物品，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因此，哈拉浩特的拜星君古物是有很大价值的。它们使我们能很好地研究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化影响如何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由于有了哈拉浩特古物和彼里奥对摩尼教经文的研究著作，关于从近东传来的、建立在古代巴比伦人拜天基础上的摩尼教②影响的问题，才第一次得到了说明”。

根据上面所谈，哈拉浩特城所在的甘肃地区的过去历史大致如下。从甘肃被中国征服时起（公元前二世纪），中国文化就在这里确立了下来，但因这个地区位于中国极西部，所以它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它有几次曾长期与中国分离。例如，从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甘肃划入了土番版图，而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划入了唐古

① 据索·米·科切托娃查明，哈拉浩特的许多神象都是拜星君的。在本书初版中，这些神象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明。

② 一个拜天的基督教派别。

特人国家西夏的版图；然后，这个地区又被蒙古人（成吉思汗）所征服。十四世纪时，甘肃又被中国征服，而且中国人在1372年把哈拉浩特毁坏了。在哈拉浩特发掘出来的材料属于甘肃被唐古特人占领时期的东西。不过，其他一些研究人员<sup>①</sup>也指出，该地文化基本上仍然是中国文化，虽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族特点，这些民族特点将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哈拉浩特古物过程中得到证明。

虽然十一世纪时西夏国出现了自己的文字，汉语汉文仍被广泛使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儒家教育传入西夏，其结果是如同中国一样，在这里也设立了翰林院。十一至十四世纪，显示出西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哈拉浩特发现物中有所谓西藏画法的神象，这些神象按风格与较晚的西藏神象不大相同，不过在神象的内容和面貌上与西藏神象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点，谢·费·奥尔登堡院士曾经证明过。此外，还发现了反映伊朗影响的有关蒙古文字史和著作史的有价值的材料（见本书正文）。还应当指出，在哈拉浩特的搜集品中有日常生活用品——手工工具，以及丰富的陶器搜集品，这些陶器就其制作技巧和风格来说，与宋时的中国陶器（十至十三世纪）很相似。

彼·库·科兹洛夫从诺颜山古墓中获得的物品，属于比这早得多的时期，即公元前一世纪。

关于这一发现的意义，A·H·伯恩施坦（1937年）指出：“彼·库·科兹洛夫率领的苏联考察队1924年在诺颜山古墓中的发现，理所当然地属于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发现”。

诺颜山属于肯特山脉，位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北130公里处。彼·库·科兹洛夫在诺颜山发现了二百一十二座古墓，发掘了六座大墓和四座小墓。这些古墓是两千年前住在这里的东匈奴贵族的坟墓。在墓中发现了地毯，毛织品和丝织品，木制品和金属制品，典型的陶器制品，为表示悼念而陈设的发辫以及其他物品。

一些考古学家指出<sup>②</sup>：“彼·库·科兹洛夫的1924—1925年蒙古和西藏考察队所获得的材料，第一次为科学界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无论就物品的丰富多采来说，还是就一些极稀有物品——古代典型的纺织制品的数量空前之多来说，都是如此”。

在发现物品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成为当地匈奴人的艺术特色的毛毯上的奇异图画（采用贴花形式）。一块有野兽角斗图的大地毯特别引人注意：一张图画的是只有翅膀的猞猁向一头驼鹿攻击，另一张图画的是头公牛与一只神奇的狮身动物角斗。这些动物的姿态都很自然而活泼。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出色的作品属于艺术发展早期阶段的兽形艺术风格。诺颜山的发现说明，即使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造形艺术已采用纺织技艺。与诺颜山发现物相似的物品在中央亚细亚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发现，例如在楼兰和西伯利亚就发现过此类物品<sup>③</sup>，这就说明东匈奴人的文化当时传布很广。

在诺颜山发现物中还有一些纺织品，它们说明中国以及希腊文化传播区对匈奴人的影响。

① 见《图书消息》，1933年，第2—4期。

② 《对诺颜山纺织品工艺的研究》，载《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学报》，1932年。

③ Г·索斯诺夫斯基：《西伯利亚最古老的毛织品》，载《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问题》，1934年，B·2。

例如，在毛织品上绣着三个骑马人和一个从花中长出的人形以及其他一些图画，都是希腊风格的图画。希腊影响和希腊艺术作品本身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这里。

K·B·特列维尔认为，这一影响来自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是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属地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共存在115年（公元前250—135年）。它占有从阿姆河到印度这一片地区。

K·B·特列维尔写道：“……只有引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史以及中亚、伊朗、印度和中国文化史的材料，才能解释诺颜山发掘物品中的某些毛织品刺绣；这些刺绣早在1925年就使我相信，我们所见到的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艺术古物”。①

从诺颜山古墓中也获得了中国文化物品。这是一些带刺绣或不带刺绣的丝织品和上过漆的木制品。其中一幅刺绣品上面织有中国所特有的有翅膀的龙象。一只中国制的小杯，上面刻着制造的确切年代——公元前二年，因而很有价值。

在古墓中获得的中国纺织品，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纺织品。据A·H·伯恩施坦考证，中国早期的特别是汉朝的纺织品种类是很丰富的，不过，“上面所谈的材料，特别是陶器……以及运来的中国和巴克特里亚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说明匈奴人本身的生产极为原始……当地生产的物品极其粗糙，而匈奴首领墓内却布置得很豪华，这就无可置疑地证明匈奴社会内部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伯恩施坦，1935年）。

因此，诺颜山古墓中的发现，为研究中央亚细亚古代各民族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习惯，艺术和技术，提供了广泛的材料，使人们对当时的社会关系也有所了解。“彼·库·科兹洛夫的1924—1925年蒙古西藏考察队所获得的材料，第一次为科学界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无论就物品的丰富多采来说，还是就一些极稀有物品——古代典型纺织制品的数量空前之多来说，都是如此”。（《对诺颜山纺织品工艺的研究》，《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学报》，1932年）。因此，现在就有必要研究修复古代纺织品的科学方法。

考古工艺研究所首次对诺颜山的古代纺织品进行历史工艺研究和修复工作。②

由于进行了这些修复工作，纺织品（例如上述织有野兽图的地毯）的鲜艳色彩就显示了出来（见《诺颜山原先色彩的恢复》一书中鲜艳的插图，1937年）。

哈拉浩特和诺颜山古墓的发现物，保存在国家列宁格勒美术馆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人人都可以看到。

此外，有些物品还曾运往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1929年运往柏林，1935年运往伦敦，1940年运往莫斯科。

还应当指出，科兹洛夫的某些发现物曾在为参加1935年伊朗大会而组织的列宁格勒美术馆展览会上展出。

由于中央亚细亚的古物发现得很少，彼·库·科兹洛夫的发现的科学价值就更大了。能与彼·库·科兹洛夫的发现相媲美的只有雅得凌采夫在蒙古鄂尔浑的发现③以及

① 《北蒙历史考察的简要报告》，1925年，第30页。

② 该研究所附属于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

③ H·M·雅得凌采夫：《1891年在鄂尔浑和南杭爱旅行报告和旅行日记。鄂尔浑考察著作集》。



阿·斯坦因<sup>①</sup>在敦煌窟内发现（在时间上与哈拉浩特的发现相近）和在东土耳其斯坦对楼兰古物<sup>②</sup>（与诺颜山古物相似）的发现。

对彼·库·科兹洛夫所获得的大量考古材料的整理加工，尚远未完成。其中，对从哈拉浩特弄来的大量书籍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毫无疑问，在不远的将来，经过对这些材料整理之后，将在中央亚细亚古代各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方面有一系列的科学发现。

作者在撰写本序文时利用的书籍有：

A·H·伯恩斯坦：《诺颜山古墓中的金属牌上的公牛象》，载《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问题》，1935年，第5—6期。

A·H·伯恩斯坦：《东匈奴人的社会结构问题》，载《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问题》，1935年，第9—10期。

A·H·伯恩斯坦：《诺颜山匈奴古墓及其历史考古价值》，载《苏联科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部分》，1937年，第4期。

彼·库·科兹洛夫：《1923—1926年国家俄罗斯地理学会蒙古——西藏考察队简要报告书》。

谢·费·奥尔登堡院士：《哈拉浩特佛象（西藏画法神象）材料》载《俄国民族志材料》，1914年，第2卷。

K·B·特列维尔：《1924—1925年在蒙古的发掘物中的发现》，载《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学报》，1931年，第9—10期。

C·特列威尔：《在北蒙的发掘》，1932年列宁格勒版。

K·特列维尔：《希腊——巴克特里亚的艺术古迹》，1940年版。

## 汇 编

《1932年图书通报》，第1期；1933年第2—4期。《诺颜山地毯原先色彩的恢复》，科学院与国家列宁格勒美术博物馆，1937年。彼·库·科兹洛夫1909年在哈拉浩特的发现。

与彼·库·科兹洛夫1925年蒙古——西藏考察有关的历次考察队考察北蒙的简要报告书。

对诺颜山古墓埋葬的纺织品工艺的研究，载《国物质文化史学院学报》，第11卷，第7—9期，1932年。

（内蒙师院外语系翻译组郑德林译自彼·库·科兹洛夫所著《蒙古、阿木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苏联国家地理书籍出版社，1948年版。）

① 阿·斯坦因：《荒凉中国的废墟》，1912年伦敦版。P·皮里奥特：《1914—1922年的敦煌窟》，巴黎版。

② 阿·斯坦因爵士在中亚废墟上发现的中国古代刺绣丝织品。由F·H·安德罗斯描绘下来。载《伯林顿杂志》，1920年7—9月。